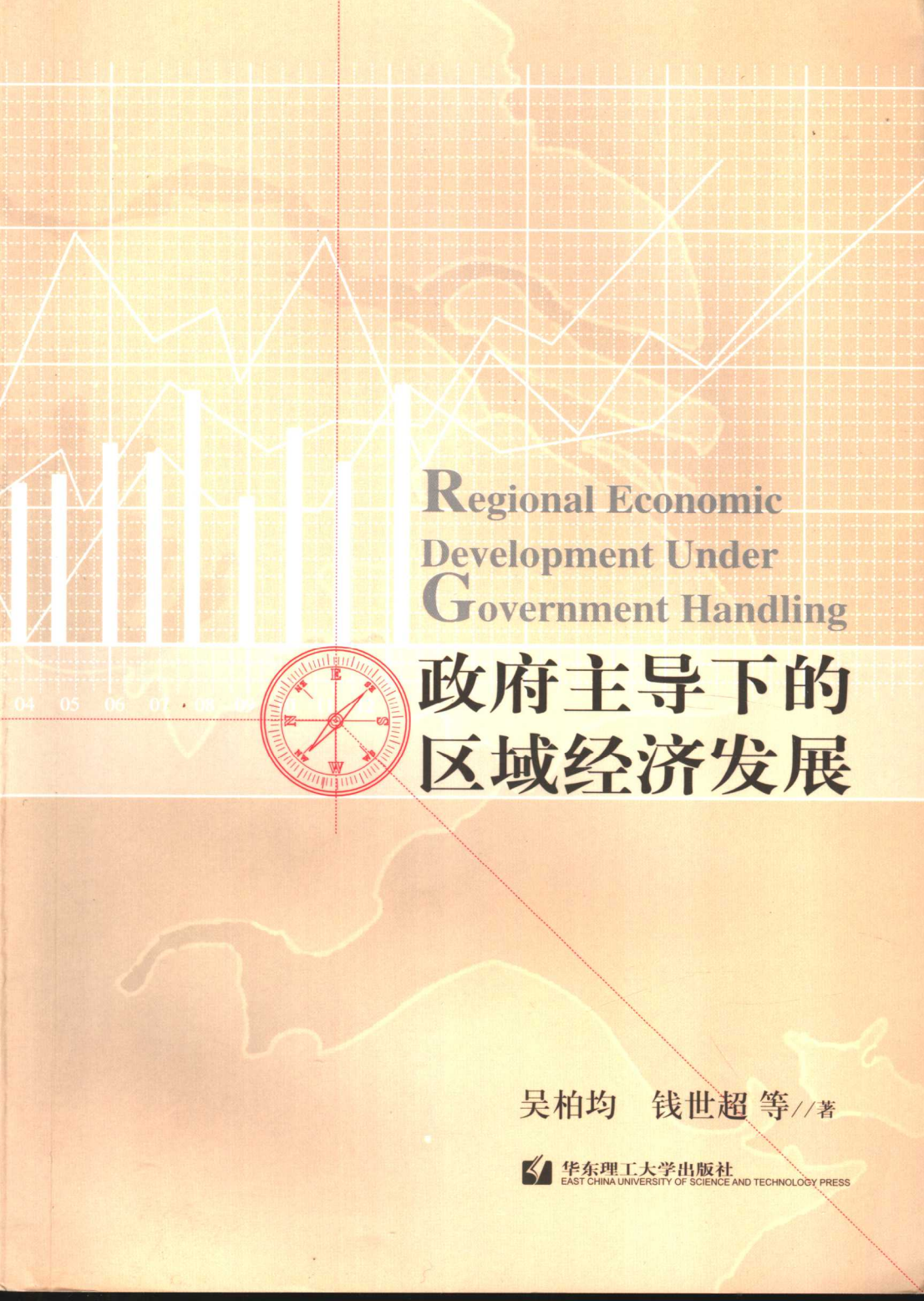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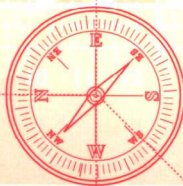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Government Handling**

**政府主导下的
区域经济发展**



吴柏均 钱世超 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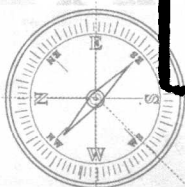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Regional Economic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
政府主导下的
区域经济发展



吴柏均 钱世超 等//著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府主导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吴柏均,钱世超等著.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11

ISBN 7-5628-1976-9

I. 政... II. ①吴... ②钱... III. 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6306 号

政府主导下的区域经济发展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Government Handling

吴柏均 钱世超 等著

责任编辑 / 严国珍

封面设计 / 戚亮轩

责任校对 / 金慧娟

出版发行 /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梅陇路 130 号,200237

电话:(021)64250306(营销部)

传真:(021)64252707

网址:www.hdlgpress.com.cn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 14.75

字 数 / 437 千字

版 次 /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数 / 1—2050 册

书 号 / ISBN 7-5628-1976-9/F·161

定 价 / 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出版社营销部调换)

目 录

前言:政府主导下的区域经济发展	吴柏均	(1)
-----------------------	-----	-----

第一篇 政府功能转变与区域经济发展

强力政府与高效市场:长三角经济高速增长之谜	沈晗耀、钱世超、吴柏均	(17)
经济增长中的政府职能转变与公共产品供给	吴柏均、沈晗耀、杨曦	(41)
区域经济增长的一种开发区模式	吴柏均、杨上广、王睿	(68)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一些前瞻性问题:以苏州为例	沈明高、张剑宏	(108)

第二篇 区域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变动

江浙经济增长中的工业化道路研究	钱世超、杨上广	(129)
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	张艳辉	(154)
转型背景下区域经济收敛与收入分布的“极化”效应	钱彦敏、王争	(185)
长三角地区的农业增长:机制、效率与结构变动	周应恒、李洁	(211)
长三角农户家庭经济结构变迁及根源	史清华	(230)

第三篇 区域经济增长与城市化

- 长三角地区城市化比较研究 杨上广、钱世超 (271)
- 经济增长与城市边缘区的城市化:宁波江北区的案例分析
..... 吴柏均、杨上广、沈晗耀 (314)
- 长三角制造业集聚模式演进与城市群发展趋势 王红霞 (341)

第四篇 区域经济增长与要素贡献

- 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刘桂荣 (363)
- 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一个技术进步的视角 孔令丞 (377)
- 区域经济中人力资本增长的比较分析
..... 杨上广、钱世超、章辉 (408)
- 区域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形成与资本效率分析
..... 吴柏均、刘景晖 (452)

前言:政府主导下的区域经济发展

1. 问题的提出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我们似乎已越来越熟练地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解释,并进行总量的控制和政策调节。但另一方面,与经济总量增长相伴随的经济结构问题,始终没有有效的办法加以解决,从而使我们难以彻底摆脱经济增长而不甚发展的困境。为此,我们在制度的分析中找到了一些原因,但远没有构建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更使我们难堪的是,如果把研究的视角转向区域经济发展时,我们发现中国很大面积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完全不相适应。从经济学的总量方法去分析这一资源配置结果,认为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在现实经济社会中,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是放在各区域内部去讨论,还是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或者说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去思考却成为了一个问题,即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收入差距日益扩大问题,它已演变为公众敏感的社会和政治议题。同时,在沿海地区和一些开放的中心城市,尽管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和制度安排不断反复,但区域内部的政府、企业和其他经济主体则具有了很强的反应能力,或具有了调节和消减外部压力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区域经济能够保持长期的繁荣,或者说经常导致宏观经济的所谓“过热”状态。因此,中国经济发展中,总量的、结构的和空间的问题同时存在,并相互影响。我们要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本原问题,以区域为研究对象,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作出经验实证的分析,这可能是一种比较有效的途径。

2. 已有的研究成果与理论基础

在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最初的经济地理理论似乎并不能满足人们寻求快速发展的功利性需要,尽管它为产业布局、资源的区域配置等长期的发展计划提供了基础性的研究成果。20世纪50年代以后,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为我们注重经济发展中的区域性特征打开了一扇窗户,但这些学科本身并没有建立起扎实的理论基础。与经济地理具有渊源关系的发展极理论、点轴开发、梯度发展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的大推动等等经济增长理论,被视为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良方。但事实证明,这些发展的模式和战略性的研究,除了为地方政府官员的执政目标和赶超行为提供理论依据外,较少符合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为长期的发展规划提供科学的依据,由此也使理论与实际的区域发展路径存在非常大的差异。

尽管如此,这种战略性的研究至今仍有很大的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财政体制的变革和地方政府经济资源支配权限的扩大,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需求日益增加,特别是近10年来政府不断强化行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总体规划,创造了区域理论分析与实际结合的良好时机,诸多学者承接了大量的规划课题。但就我们承担课题的情况和所见的许多其他规划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成果缺乏详实的区域自然和经济条件的基础分析,成为应景之作。上级政府的政治偏好和行政考核指标更使规划的制定和执行具有领导主观性和时代政治特征。由此,代表一个国家区域经济研究水平和推动区域经济长期发展的规划工程,在我国如堂皇的宫殿建筑在流沙的基础上。

真正对中国区域发展问题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以后。基于市场化过程中一些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一系列的实证分析成果为我们揭示了广东外向型模式、深圳特区模式、浙江私营经济模式、江苏苏南经济模式、上海浦东国际化模式,以及其他带有市场和制度创新意义的区域局部发展方式。这些经验实证的研究成果,在为政府提供区域发展经验的同时,也使学界逐渐累积起了基础性的研究资

料,发现了一些切合实际的研究路径,梳理出一些具有中国特色和学术性的观点,一些研究成果已具有较强的理论逻辑性。这些成果中,两个地区的系列研究深为国内外学界关注,并形成了区域经济研究中的开创性成果。一是由温州模式开始扩展至浙江现象的研究,它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过渡经济中市场制度是如何建立的,制度是如何变迁的,以及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张仁寿等,1990;史晋川等,2002;朱华晟,2003);二是苏南模式以及演化后的区域内外资资本影响力的研究。其理论的贡献是揭示了政府及行政力量在区域经済中新的作用形式(万解秋,1993;洪银兴等,2002,2003)。目前,这两个地区的研究仍在不断深化中。

此外,基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特征,学术界自然地把研究的视角较多地集中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和角色问题上。遗憾的是,除了阐释凯恩斯、斯蒂格利茨的论述和总体上判断政府在经济中的功能外,我们还缺乏大量细致的实证性分析。所以,这一领域的研究,经济学似乎一直落后于历史学和社会学,起码这些学科对中国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功能分析,已在实地调查和文献的分析中,提出了如政府公司主义、地方法团主义、谋利型政权经营者等学理性概念(丘海雄,2004)。近年的情况有所改善,其中世界银行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组关于国家发展与地方财政的报告,可称为有价值的成果,它细致地勾画出政府在区域经済中的部分角色面貌(黄佩华、迪帕克,2003)。

在研究的理论基础方面,正如我们在区域经済研究中的理论创新特色在于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在近10年的区域经済研究中,除了广泛运用传统的增长理论外,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得到了运用,一些案例的分析,为我们如何抓住微观的事例揭示宏观的变动趋势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方法样本。此外,尽管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尚未以演化经济学理论方法做专门的研究,但大量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区域经济发展中要素配置方式、市场主体、经济交易方式等等的演化特征和内涵,它们丰富了区域经済学研究的方法,并拓宽了研究领域。

此外,新近的空间经济学(Spatial Economics),或称之为新经済地

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为我们讨论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思路和分析工具,也改变了主流经济学无空间内涵的经济理论。其中经典的中心外围模型提供了新产业(工业及非农产业)集聚的基本分析方法;以城市层级体系的演化为特征的新城市理论,为我们讨论以城市为基础的经济中心的形成和演化奠定了理论基础;以产业集聚、国际贸易与区域经济关系为中心内容构建的国际模型,不仅使我们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认识对外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也从微观的层面上更容易讨论产业成长中的贸易因素和一些空间变量。当然,与所有的理论存在一定的应用条件一样,上述理论仅提供了经济发展在空间视角下的一般机理,但是回到我国区域经济的实际,我们就会发现,即使是最近的理论可能也难以揭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无论是集聚(Agglomeration)、CP模型、市场潜力等等,常常表现为区域的结果性或预期结果状态,我们无法从中获得导致这种状态的关键性因素。或者说,我们需要另外去寻找决定区域经济发展、培育特定经济区位机理,并能使之产生活力的内在因素。这也表明了我们在理论上需要扩展研究的视角,并增加研究的变量;一些理论观点需要寻得更多的经验实证的支持。

3. 本书主要研究内容与我们的观点

正是出于上述理论探索的愿望和现实经济问题的挑战,我们一些志同道合的研究者,以华东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为研究平台,试图通过经验实证研究,揭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新的特点和内在的动因。研究计划分为几步进行,首先我们希望对长三角这一经济发达地区有个全面的分析,特别是针对这一地区迅速成长起来的工业区、城市和工业品专业贸易市场,讨论这些经济资源的空间配置方式,及由此产生的知识外溢、市场规模和优势、产业和市场关联效应;同时探讨这些因素的外部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力;特别是我们希望进一步地揭示这一区域何以比其他区域更多地累积起这些因素,形成累积的机制,产生出更多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把研

究区域扩大到中部经济不甚发达的区域,进一步讨论约束这些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本书是第一阶段工作的一些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分析了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总量、结构及其空间特征,以及决定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我们的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不仅长期保持了两位数百分比的增长,更有意义的是近 30 年来在经济结构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既反映在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产业内生产结构的变化和工业化水平的大大提高,使长三角的大部分地区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甚至中后期的阶段;也反映在要素流动、投资结构、劳动力结构、农户经营方式、居民收入与消费方式等经济各个方面的结构变化。另一个经济成就则是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大,中国城市的成长突破了几千年来城市主要依赖于政治资源的集中而发展的格局,融入了商业城市的许多成分。

这些经济成就的取得,与所有区域的经济增长决定因素一样,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在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不带有内生性增长的特征,但我们的研究表明,在经历了初始阶段的技术引进和应用后,近 10 年技术累积和外溢的效用日益明显,从而为要素的配置和重新配置效率的提高,以及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基础和内生的机理。我们在宁波地区调查时发现,被视为缺乏技术基础的工业消费品生产与销售市场中,由于大量的日益专业化的外贸公司的发展,制造业企业和贸易厂商能够快速获得国际市场的信息,引进先进的制造技术与设备,设计能力迅速提高,原材料供应和产品的生产分工与协作体系已经建立。因此,不同于常规的企业内的知识经济,在宁波这一经济区域市场范围内,事实上形成了贸易和生产厂商协作中的知识经济体系。

同样,我们的研究再次表明,被视为浅显的、长期被忽略的决定经济增长的贸易因素,在长三角地区,特别是浙江经济增长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曾经对温州经济增长中的区域间贸易贡献度做过一个分析,证明温州经济的增长和资本形成得益于区域间贸易规模的扩大和长期的贸易顺差(吴柏均,1995)。同样,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于

贸易规模的扩大和贸易顺差的增加,为区域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资金积累和市场需求的贡献。正如众多的研究成果所表明的那样,浙江的工业品专业市场和消费品专业市场的发展,既为产业集聚的形成,也为贸易规模的扩大提供了独特的空间条件。

对于产业集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近年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我们对长三角地区产业集聚的研究表明,在这一区域,产业集聚的含义和方式是多样化的,既有典型意义上的制造业集中形态,如在江苏和上海的一些地区;也有工业品专业市场为纽带的贸易与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形态,如浙江的一些地区。有意思的是,许多学者总结的产业集群归类,均可在长三角区域找到例子。我们在绍兴、苏州和上海等地可以分别找到阿明(Amin)归纳的以手工业为基础的传统产业集群、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高科技产业集群和基于大企业的产业集群;也可以找到汉弗莱(Humphrey)以生产者驱动的产业集群(主要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消费者驱动的产业集群;同样也存在着强调市场分工与合作的产业集群、基于低廉劳动力成本的卫星式产业集群。在苏南和浙江,也存在法里内利·迈特尔卡(Farinelli Mytelka)识别出的自发的非正式产业集群和有组织的产业集群。有意义的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一旦产业集聚形成,区域经济环境得到日益改善,从而支撑了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更强的集聚效应,这是一种空间集聚不断自我强化的积累过程。而且,源于市场需求(生产需求和消费需求)的生产者、贸易商和消费者集中,所产生的前后向关联效应,没有非常大的外部环境改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空间上是很容易延续下去的(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等:2005)。这意味着,即使外部投资和政府投资减少,并不一定如常规的经济分析所推理的,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会很快减弱,由产业集聚产生的关联效应和其他竞争力会使它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区域经济竞争优势。

对于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原因的探究,除了上述古典和新古典因素之外,我们在实地的调查中,明显感受到制度变迁和制度安排的作用及影响力。这种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培育了原始的市场力量,也释放了长期被遏制的经济活力,调整了资源的配置方式,宏观上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二是如上文提及的,市场

主体及市场交易制度本身得到不断的演化,扩大了交易规模,提高了生产和交易效率,从而使资源配置的微观效率得到明显改善;三是随着政府工作重点的转移和职能的转变,政府对市场交易的直接干预有所减少,也正在逐步退出竞争性的制造业生产领域,但政府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仍然巨大。

对此,我们重点调查研究了苏南地区,并考察了浙江的嘉兴、宁波、金华和温州地区。我们发现,长三角地区不同的行政区内,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和作用方式是不同的。在苏南地区,地方政府基于行政权力,凭借体制变革后获得的财政收入分成权、项目审批、融资权和对土地资源的处置权(土地转让权),出于经济增长和经营城市的目的,常常通过对经济资源的行政控制和准市场的配置,在私人产品经济领域,通过创造企业发展环境,降低区域内企业交易成本,促进私营企业发展。典型的例子是政府设立经济开发区,以优惠政策招商引资。或者鼓励和投资建设工业品和消费品专业市场,以带动产业发展;在公共产品领域,地方政府凭借其不断增加的公共财政能力和长期以来对公共产品部门的经营垄断权,以政府行政管制或国有公司垄断经营的方式,通过向金融机构融资,在远远超过政府预算内财力的情况下,大规模地负债经营公共产品,特别是投资建设城市基础设施等准公共产品。所以,使区域经济演化为既不是完全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市场化经济,也不是以行政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在微观上,基于外部经济环境和市场制度,企业自主经营和自由交易制度得到充分发挥和保护;在宏观层面,政府通过对资源的控制和很大程度上的行政配置(尽管越来越以市场交易方式),主导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空间格局和功能定位。

我们通过对经济开发区和公共产品供给案例的进一步分析,发现苏南地区的区域经济中已形成了强大的政府经济,这部分经济主要由原有的国有企业、新成立的专营各类公共产品的政府投资经营公司和开发区经济组成,政府经济在投融资、生产经营和管理上自成体系,形成了自循环系统。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居民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增长,政府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和经济影响力急剧增加。

这种政府控制资源、强势介入或直接经营的经济机制,显然,在浙

江等私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少见运行。但我们透过遍布乡镇的私营企业和各类专业性市场,仍然可以发现政府对土地、能源等资源的行政控制和经济垄断。规模越来越大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超越自由市场经济需要的政治经济管制,特别是近年内私营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预算内和预算外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一个县市的年财政可支配收入达到几十亿元的水平,其财政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支出所产生的经济流量在地方经济总流量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政府开始较大程度地影响地方经济的格局。这种影响特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与苏南等地区一样,近年来,这些地区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日益迫切,由于原有的基础相对较差,政府在此领域的投资每年大量增加,政府及其控股企业的经济影响力也逐步增强;其二,政府把城镇发展和规模扩大作为执政期内的重要目标,因此,也开始采用上海、苏南等地的方式,设立投资建设公司,直接投资,参与城市建设项目,且投融资的规模快速扩大;其三,由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长三角地区的工业和商业用地日益紧张,政府通过规划指标和土地转让权的控制,既影响了地区内产业选择和企业发展,也获得了巨额的收入;其四,对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效应的调节,特别是在浙江私营经济发达的地区,众多私营企业的发展、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和外地劳动力的大量流入,使社会治安、城镇与农村管理、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等问题日益突出,但由于社会自治组织的缺失,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形成,因此,基本上是地方政府采用强势的行政方式予以管理,这种政府在社会事务中的强化管理也正在日益影响经济活动。

由此,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长三角地区,总体上是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其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特殊性在于:作为经济主体之一的地方政府,直接担当了区域经济增长的经营者角色。它按区域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主导区域内的各类经济活动,组织区域内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生产,力争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税收和地区国民生产总值,支持或直接参与区际或国际的经济竞争和合作,推动本区域经济发展,同时兼顾区域管理者的身份,做好维护区域内社会公平和秩序工作。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政府主导型经济,使区域经济充分发

挥了重新配置资源、发掘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潜力。它在给定资源和技术的条件下,通过制度的重新安排,使资源从边际生产率低的领域流向边际生产率高的地区和项目,从而使社会总产值得以快速增加,这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上。

由此,在政府主导下的区域经济中,自由的市场交易制度与政府行政管制并存、一般私人产品的竞争性经营与公共产品的垄断经营并存,强力政府与高效市场得到有机耦合。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就是这种经济制度和形式的形象写照。近年来,政府在公共产品领域也直接担当着主角,唱着大戏。

出现这种经济体制、机制的基本原因,是传统的行政计划制度的功能延续和私有产权基础的缺乏。在苏南地区,1970—1990 年政府推动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政府建设开发区、吸引外资企业,其目的和运行机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政府通过行政方式配置资源和利用行政力量动员区域内外资源,培育区域经济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同样,浙江一些地区的政府在以私营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发挥其主导经济作用,其基础仍然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具有的对一些基础性经济资源的垄断权和行政处置权。因此,这些行政权力体系和资源的垄断控制格局不变革,特别是如果土地制度不改变,经济资源的集体产权和私有产权不能充分得到保护,公共产品的投资和经营体制不改革,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资源短缺的日趋紧张,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的日益增加,政府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将持续增强。

我们的研究无意讨论政府干预或参与经济活动是否有益或有害这一问题,尽管世界银行的研究者通过对近 50 年各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的研究,表明“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不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有效的政府,而不是小政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世界银行,1997)。这似乎为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但是我们还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在提高生产效率上有积极的意义,而这恰恰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目前,长三角区域地方政府的行为,在区域资源配置效率上的绩效是明显的,但除了为企业提供一些外部的激励

条件外,很难直接证明它提高了决定经济长期和持续增长的生产效率。在理论上,生产效率只有靠市场经营主体通过(广义的)技术进步提高单位资源生产效率才能获得。

与此密切相关,另一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政府参与和干预经济的效率问题。尽管我们在实际调查中,感觉到和可以列举出政府投资和经营的无效率想象、“挤出效应”和对私营经济的经营限制。特别是,已引起全社会关注的粗放经营、无序开发和经济、社会和环境间的不均衡发展都明显存在着,但在区域范围内这是一个难以“证伪”的问题。相反,快速的城市规模扩张及其城市设施的建设、持续的高经济增长率和区域贸易量的增长,都体现了政府主导、推动经济的政绩和效应。因此,目前我们能做的仅是从历史的轨迹中分析,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何以担当了经济主导的角色,并推动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为未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走向提供一些判断,而难以以“规范”的方式评估政府的行为方式。

或许从长三角一些地区经济发展的事例中,能够证明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和城市化的源泉在于政府经济与私人经济的双轮启动,或者说是双引擎运行。但我们仍然谨慎地认为,这是在特定体制下和特定时期的一种发展方式。从经济增长的长期含义上理解,面临包括经济资源条件的变化和配置效率的递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否能够持久和具有长期的绩效,仍是值得怀疑的。

此外,本书还讨论了未来区域经济发展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政策性的建议。

4. 调查过程与研究方法

这项研究工作,已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期间我们实地考察了长三角地区的一些城市、乡镇及村,特别是得到了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政府及无锡市、宁波市、嘉兴市等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的支持,我们经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生也参与了实地的调查和资料整理工作。2006年5月27日研究所举办了以“政府主导下的区域经济增长”为主题的研讨会,全国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就此进行了学术性讨论,提出了

许多有价值的论点和深入研究此论题的建设性意见。本文集收入了其中几位学者的学术论文,尽管有些论文主要研究全国性的问题,但其内容和思考与我们的研究主题密切相关。

通过调查与研究,我们深刻认识到要全面地解释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因并非易事。我们的研究成果与课题设计的思路和目标可能相距甚远。特别是活生生的现实经济活动和市场主体的创造力,无时不在变化,使人应接不暇,难以形成所谓的真知灼见。但正如我们一开始工作时相互鼓励和认可的:“史无定法”,我们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解释,可以运用主流的经济学方法,但更推崇 19 世纪中叶科学哲学所认为的,科学考察从对事实的自由而无偏见的观察开始。因为我们习惯运用的主流经济学的假定——推理模式,基于一个基本的观念,即认为所有真实的科学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结构,即所有的科学解释都至少包括一个一般的规律再加上对有关的起始的或边界的条件的阐述,这一规律和阐述组成了阐释或前提,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就可以推论出待做的解释,即关于我们所要解释的事件的阐述,在这个推论过程中我们不需要借助任何其他帮助而只需要推理逻辑(卡尔·亨普尔、彼特尔·奥本海姆,1965)。事实上,这种方法可能使我们的研究与事物本原相差甚远,最后的解释常常是一种“倒写的预言”。

因此,“放任”研究的结果是,我们从事实的自由的观察开始,但以缺乏有系统解释的成果收尾,更少有理论的逻辑分析。这也是囿于我们研究能力的有限和资料准备的不足。本书必定存在各种不足和错误,祈望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 [1] V. 奥斯特罗姆等. 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2] 斯蒂格利茨. 政府经济学[M]. 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
- [3] 斯蒂格利茨. 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M]. 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 [4] 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等. 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

与国际贸易[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5] 史晋川,等. 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M]. 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2.

[6] 张仁寿,李红. 温州模式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7] 史晋川,罗卫东. 浙江的现代化道路:1978—1998[M]. 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

[8] 朱华晟. 浙江产业群——产业网络、成长轨迹与发展动力[M]. 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3.

[9] 方民生. 浙江制度变迁与发展轨迹[M]. 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10] 陈凌. 民营经济与中国家族企业成长[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11] 盛世豪、郑燕伟. 浙江现象: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12] 卓勇良. 挑战沼泽——浙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13] 万解秋. 政府推动与经济发展——苏南模式的理论思考[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

[14] 朱通华. 苏南模式研究[M].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7.

[15] 陶友之. 苏南模式与致富之道. 上海:上海科学出版社, 1988.

[16] 洪银兴,刘志彪,等. 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机制[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17] 洪银兴,陈宝敏. 苏南模式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J]. 宏观经济研究, 2002(10).

[18] 新望. 苏南模式的终结. 北京:三联书店, 2005.

[19] 丘海雄、徐建牛. 市场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角色研究述评[J]. 社会学研究, 2004(4).

[20] 吴柏均. 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研究[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